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林家骊 孙 宝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 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 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 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 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 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儒学; 文学; 互动

On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the Literature of Three Kingdoms and the Jin Dynasty

Lin Jiali Sun B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Three Kingdoms and the Jin Dynasty, Confucianism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in four aspects: (1) *Wenxue* and *Wenzhang* absorbed the Confucian outlook o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while keeping the outstanding traits of literature itself. (2) Lyricism was emphasized, with the carrying forward of the Confucian notion or philosophy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Han Dynasty. (3) Confucianism achieved a profound impact on Confucian scholars' personalities and literary tastes. And (4) Confucianism penetrated all domains of the society and life,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compositions of praise and criticism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Confucian value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in Three Kingdoms and the Jin Dynasty; literature; interaction

目前,学界对魏晋文学与儒学的交融互动情况关注较少^①,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从思想

[收稿日期] 2008-02-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BZW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基金资助项目(01JD750.11-44002)

[作者简介] 1.林家骊,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2.孙宝,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① 较可代表的有谭德兴《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互动》(《北方论坛》2004年第2期)与黄黎星《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两文均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与文学的交互关系立论,有其独到之处,而对魏晋时期的评述稍嫌笼统。

层面看,魏晋玄学兴盛,儒学虽是此期的统治思想,但多体现出中衰及保守特征,不及玄学更受士林及统治上层的推崇;从文学观念的发展看,学界多注重魏晋文学在抒情性及形式美等方面的突破,强调魏晋文学与儒学疏离的一面,而对它继承先秦两汉儒学文艺观的另一面缺乏足够重视;从人格涵养的形成看,魏晋刑名法术、老庄佛学与儒学形成争鸣局面,文人的人格层次、价值观念更趋丰富多元,而学界较少注意到魏晋儒学对文人的显在作用已转为潜在的影响;从文学创作上看,学界多津津乐道于魏晋文学的玄化特征,如对玄言诗、玄言赋的研究日趋深入,却对此间流露出鲜明儒学思想意趣的诗文关注不够,对其艺术特征和成就的评价也相对较低。笔者认为,虽然魏晋儒学萧条以及文学自觉化进程加速是造成两者关系松动的决定性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外在表现形式仍呈现出深入、广泛、多样等特质。因此,笔者拟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探讨。

一、魏晋“文学”、“文章”观对儒家政教观的吸纳与文学化特征的凸显

魏晋时期文学意识已趋于独立,然而其与儒家教化原则又具有并行不悖、勾连互动的特点,通过考察此间“文学”和“文章”两个观念的演变就可以看出。魏晋“文学”具有多重含义,如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礼仪典制之学、学校庠序、军府或太子属吏等。除此之外,魏晋“文学”还多包含辞章才艺与儒家经典之学的双重内涵。如曹操《百辟刀令》说:“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1]卷三,1067上 阮籍《与晋王荐卢播书》说:“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2]66 张华《答何劭诗》其二说:“虚恬窃所好,文学少所经。”^[3]344上 庾亮《武昌开置学官教》说:“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1]卷三六,1671上 上述“文学”大多融合辞章与学术两个层面,然而辞章的意义比重已非常大。如陆机《谢吴王表》说:“复以颇涉文学,见转为殿中郎。”《与吴王表》又说:“臣以职在中书,诏命所出。臣本以笔札见知。”^[1]卷九七,2016下 可见,“笔札”之才才是陆机以“颇涉文学”迁升的直接原因。总之,魏晋“文学”一词虽为组合概念,但其对文学创作才能的偏重非常明显,这已与先秦两汉时期大为不同了。葛洪说:“圣人实之于文,铸之于学。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1]卷一一七,2134下 他已将辞章之“文”与经典诸子之“学”区别并列,“文”的独立价值自然被突出出来。吴人陆景《典语》亦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搃笔于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礼乐之渊之盛也。”^[1]卷七〇,1433下 陆景特意指出“文”具有“执卷于儒生之门,搃笔于翰墨之采”的两重性,体现出魏晋文学观从先秦两汉文章博学向缀篇修辞的过渡状态。

“文章”一词,魏晋之前除指色彩条纹外,主要指儒家典章制度、经典文献等。两汉“文章”已多有文学化的含义,魏晋则呈深化之势。如夏侯惠《荐刘劭》说:“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1]卷二一,1165下 华覈《上疏请召还薛莹》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1]卷七四,1450下 葛洪《抱朴子》说:“观此二人(指陆机、陆云),岂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1]卷一一七,2132上 他们无疑充分认识到“文章之士”与“制度之士”或“儒雅之士”与“文章之人”的不同,并有意识地突出“文章尤妙”、“记述之才”的独特价值,“文章”文学化色彩显然加深了。应该说,魏晋“文章”较“文学”更接近后世文学观念。如魏明帝《诏何桢》说:“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1]卷九,1104上 陆云《与兄平原书》说:“文章当贵经绮。”^[1]卷一〇二,2043上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4]卷六,287上 由此可知,魏晋士人将“文章”作为对诗赋创作的概括之辞,已与后世文学观念差别不大。正因如此,魏晋文学总集也往往冠以“文章”之名,如挚虞《文章流别集》60卷、《文章流别论》2卷、《文章志》4卷,荀勖《文章叙录》10卷等,即是其例。《文章志》、《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乃是挚虞对汉魏辞赋及其他应用文体创作搜罗、编选以及评鹭高下的成果。他总结“文章”的意义说: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1]卷七七,1905上} 挚虞在“文章”中寄寓深厚的道德教化意蕴,无疑顺承了汉代儒学化的文学观念,同时其外延也扩大到诗、颂、诔、箴等方面。当然,将儒家六艺经典与“文章”联结,并非挚虞一人的观念。如傅玄《傅子》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1]卷四九,1740下} 就充分体现出了以儒家六艺经典作为文学源头的意识,这对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也不无影响。

二、魏晋文学的重情风貌与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

魏晋士人尤为强调文学创作的抒情、娱情、言志等功能,这离不开对此前儒家情性观的继承。如《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载:“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5]卷九,2400下} 《郭店楚墓竹简·语丛四》说:“言以词,情以旧。非言不酬,非德亡复。”^{[6]217} 显然,儒家认为言语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是道的载体,须遵从信的原则。另外,言辞还具有传达情感的功能。当然,关于言辞,孔子曾提出文质彬彬的观念,其中蕴涵了中和适度的审美标准,更是礼法意识在语言观方面的映现。因此一定程度上说,先秦儒家的情性说与文质观高度统一于礼仁和合的道德范畴之中。两汉强调文学在经学视阈中的辅翼功能,作为文学本体重要构成方面的情性、言辞则牢牢就范于经学教条之下,颂扬德业、恢弘礼教之作在在多有,刻画内心情感、追求语言藻饰的作品则不多,扬雄《太玄》是屈指可数的例子之一。扬雄注重情感价值,强调言辞对内在情志的抒写功能,同时又认为两者须遵从文质彬彬的原则。《法言·先知》就说:“圣人,文质者也……声音以扬之,《诗》、《书》以光之。”^{[7]291} 在扬雄看来,圣人不史不野、文质兼济,《诗》、《书》则又是彰显圣人德美的范本,这种思想代表了汉人的普遍认识。

顺承两汉文学抒情观,魏晋士人在诗赋创作中更加追求自身情感的充分展示。如曹植《七启》说:“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8]135} 张华《答何劭诗》其二说:“是用感嘉贶,写心中中诚。”^{[3]卷二四,344上} 挚虞《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诗》说:“情发于中,用著斯诗。”^{[9]758} 刘琨《答卢谿诗》说:“文以明言,言以畅神。”^{[9]852} 王浚《从幸洛水钱王公归国诗》说:“赋诗尽下情,至感畅人神。”^{[9]775}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说:“夫通达意气,其唯文乎?”^{[4]卷五,255} 王羲之《用笔赋序》说:“夫赋以布诸怀抱,拟形于翰墨也。”^{[1]卷二二,1580上} 应该说,魏晋士人强调诗赋的抒情性,对儒家既有言志抒情观的继承之处还是十分明显的。

当然,魏晋文士抒情时追求自然状态下的应物感发,而非预设伦理准则下的被动抒发,这与汉代文人有所区别。像卢谿《赠刘琨诗》说:“情以体生,感以情起。”^{[9]881} 张骏《东门行》:“临川悲逝者,节变动中情。”^{[9]877} 司马睿《诏答诸葛恢》:“情发于中,而寄乎物。”^{[1]卷八,1507下} 陶渊明《九日闲居》:“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4]卷二,54} 可见,魏晋士人注重在时节物候、礼赠篇什中移植情感、寄托怀想,他们不但愈加关注主体自我的心灵世界,又对外在自然投入更多欣赏的意趣,情景交融、物我一体促生了魏晋诗赋中清新淡雅、自然和融的一面。魏晋士人往往将人的情感表现纳入对天地艺术再现的范畴中来。成公绥《天地赋序》就说:“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1]卷五九,1794上} 魏晋士人重视自我情感,更重视在天地物类和合统一的前提下表达自我情感,因此描摹事物详备精细,展示内心悱恻缠绵,成为魏晋文风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主题。这些在陶渊明这里皆臻于艺术化境,他在《饮酒》其十四中所说的“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4]卷三,159},就是天人一体、物我混融的集中体现。可以说,魏晋文学的重情风貌既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又充分发展了

天人合一、情物交感的创作理念,促生了此间抒情、咏物之作互联并兴的景观,相对两汉情制于礼、以物比德的前提下情与物较少勾连的情况,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三、魏晋世儒家学与文风旨趣的形成

魏晋家学在儒学传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文人人品格、文学修养的形成都具有重要作用。如出自东吴名门的陆云就多对诗赋铭赞等创作的真知灼见。他说:“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惻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漏赋》可谓清工。”^[1]卷一〇二,2042上 由此可知,陆云崇尚清省简约、典雅精拔的文风,对于赋的起承转合、首尾照应方面尤为留心,同时还注重作品中情感意蕴的传达,赏鉴力颇高。就陆云的诗赋创作来看,隶事情况较多,文风略显典重,自然也是其品评观念的反映。陆机也不例外,他虽有时能调和清绮与繁缛之间的关系,但就多数作品来看,辞藻、典事的冗积现象还是较为突出。陆云、陆机的隶事之习正与时下复古风气密切相关,《抱朴子·外篇·钧世》说:“近者夏侯湛、潘安仁并作《补亡诗》,《白华》、《由庚》、《南陔》、《华黍》之属,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咸以古诗、《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也。”^[10]卷三〇,155-156 然而,儒家家学与补经世风一方面推动了魏晋文坛的复古创作,另一方面又造成此类作品质木无文、僵化滞涩的通病。如傅咸《七经诗》首开从儒家经典中集句为诗的先例,夏侯湛《昆弟诰》中“於戏”、“呜呼”、“俞”、“吁”、“都”等语词,均源自《尚书·尧典》、《舜典》、《康诰》、《酒诰》、《召诰》、《大诰》等篇,它们点缀在诰辞里就多有贻古之嫌。对此,张溥说:“见《弟诰》总训群子,绍闻穆侯,人伦长者之书也。但规模帝典,仅能形似,刻鹄画虎,不无讥焉。”^[11]157 其实,张溥对夏侯湛的批评也适用于魏晋多数的拟经之作。

魏晋士人的世族谱系意识非常强烈,在儒家家风的熏陶之下,他们不仅弘扬其宗族观念,也促进了自身文人与儒士双重身份的叠合。魏晋诗歌中多有吟咏情怀、抒发志向、追慕节操、批判现实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儒学价值、人格精神化、文本化和风格化的表现。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何劭《杂诗》说:“勤思终遥夕,永言写情虑。”^[9]649 潘岳《悼亡诗》其二说:“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9]636 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南山五章》其五说:“诗以言志,先民是经。”^[9]722 均有意识运用儒家赋诗言志、因物起兴、立名不朽等文艺手法和价值原则,它们正是诗人儒化人格的外显,因此诗中也自然流动着中和、典雅的人文气息。然而,魏晋士人从儒家精神原则出发的批判意识在作品中也有充分体现,如徐幹的《中论·遣交》、《抱朴子·外篇·交际》,即对世人交往的庸俗性和功利性加以抨击,他们坚持儒学伦理价值原则,翔实而形象地揭露了汉末乃至西晋私相请托、奔竞势利的世风,其笔法雄劲,遣论畅达,逻辑明晰,对比鲜明,又呈现出儒者文风激越耿介的一面。

魏晋文士强调儒学经典的文学性,提升文学地位的现象也不容忽视。如《抱朴子·外篇·安贫》说:“六艺备研,八索必该,斯则富矣。振翰摘藻,德音无穷,斯则贵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10]卷三六,163 就反映了葛洪将六艺探研与摘藻为文结合的态度。他主张文为道次,道不离文。《抱朴子·外篇·尚博》说:“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10]卷三二,157-158 因此,他认为即使乡讴俚曲、军旅鄙词,亦有观风之用、助教之效,而对当下那些吟风弄月、绮靡空洞的诗赋之作也并不欣赏,认为“或贵爱诗乘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骞拙,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10]卷三二,157,其批判的关键自然在于它们缺乏宣教载道的内涵。再如王粲《七释》说:“辞不必繁,以义为贵。道苟不同,听言则醉。”^[8]133 孙绰《孙子》说:“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辞宣于仁。”^[1]卷六二,1815下 都表明以道、义、仁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在魏晋士人文学意识中的重要地位。

四、魏晋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及其文学表现

魏晋儒学虽然受到玄学的有力冲击,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左右力量仍不可忽视。《抱朴子·外篇·循本》说:“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莫或无本而能立焉……积习则忘鲍肆之臭,裸乡不觉呈形之丑……将救斯弊,其术无他,徒擢民于岩岫,任才而不计也。”^{[10]卷四一,183}这就强调了儒学作为立身之本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它对纠正放诞世风的积极作用。深受儒家礼法观念制约的政治心态也向文学创作领域渗透,以谏谥文为例。《世说新语·文学》载陆退说:“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谏不显。”^{[12]260}显见其强化谏谥文的礼法内涵。这种强调还上升为对其文学形式美的追求。《世说新语·文学》载:“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12]267}又“孙兴公作《庾公谏》。袁羊曰:‘见此张缓。’于时以为名赏。”^{[12]258}可以说,从谏谥文的礼法意识到其艺术风格的追求,集中体现了魏晋儒学礼法化到文学化的发展脉络。

魏晋儒学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多有影响,也促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在向善修养方面,三国吴人杨泉《赞善赋》说:“伊善恶之所施,乃祸福之为阶。行德安而保身,忘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执温恭而不亏。云颜冉之遭命,怪祸福之参差。夫二贤之履道,历千载而见知。身既没而名存,厥复戚乎何为?”^{[1]卷七五,1453上-1453下}就体现出以修“善”养“德”作为立名全身之本的意识。在读书怡情方面,束皙《读书赋》说:“垂帷帐以隐几,被纨扇而读书……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是故重华咏《诗》以终己,仲尼读《易》于终身。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1]卷八七,1962上}束皙以重华、孔子、原宪、颜回等吟咏《诗》、《易》而乐道安贫的事例,赞美儒家经典的人格化和诗意化,从而在赋中将阅读儒家范本时产生的精神愉悦展现出来。儒家伦理情感在魏晋社会中也有充分的渗透和彰显,魏晋士人在亲情、友情、恩情等方面多自觉奉行仁德忠义等原则,也促进此类题材的创作。如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注引张缜评价陶渊明确说:“先生高蹈独善,宅志超旷,视世事无一可芥其中者。独于诸子,拳拳训诲;有《命子诗》,有《责子诗》,有《告俨等疏》。”^{[4]卷一,40}陶渊明的《命子诗》、《责子诗》正是魏晋家诫文学题材的一个缩影,其中蕴涵的伦理温情自感人至深。友情文学化,也是魏晋文坛的重要趋势。《毛诗序》说:“《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也。”^{[13]34}《诗经·小雅·伐木》不妨可看作魏晋众多的公宴赠答之作繁兴的先导。曹丕多喜与邺下文士命题同作,其《夏日诗》集中体现了与众文士交游的场景:“北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巧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14]164}他还与诸兄弟同作,如《登台赋序》说:“建安十七年春,上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14]120}又《于玄武陂作诗》说:“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14]161}曹丕与建安文士的游宴唱和活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产生广泛影响。当然,这些活动所蕴含的儒学伦理内涵更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可作以下结论:(1)魏晋文学意义上的“文”多与儒学学养、经典文献、礼仪制度等层面的“学”联合使用,魏晋士人重视儒家六艺经典对文学的垂范作用,强调儒学文艺观中经世致用的原则,这些都与汉代文士区别不大。随着文学独立品格的凸显,魏晋儒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性也相应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汉时期文学一味依附儒学的情况;魏晋儒学也多由显在的价值准则向潜在的文人人格、艺术格调、审美情趣等方面转化,对魏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2)魏晋文学与儒学的互动关系丰富多元,魏晋“文学”、“文章”观在充分吸纳儒家政教观的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强调抒情性,是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更大程度上的继承与发扬;儒家学风不仅对魏晋文人儒家人格理想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它还通过儒家学术文学化及儒家人格文学化等途径影响魏晋文风旨趣;魏晋儒学赋予了文学创作深厚的伦理情感和价值批判

意识,推动此期歌颂人伦与批判社会的作品层出不穷。(3) 魏晋文学一方面改变了两汉文学作为儒学附庸的地位,开启了齐梁标举性灵、注重辞采声律的风气,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浓厚的儒学积淀,弄清这一阶段儒学与文学的互动方式,不仅可从思想史的角度透视它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渊源,又对纠正学界片面强调玄学对魏晋文学影响的倾向有积极意义。(4) 南北朝、隋及初唐时期,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同样赋予文学环境儒学化的面貌,通过对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可以为探讨儒学与文风建构的历史性课题提供必要的线索和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Yan Kejun, *Quan Shanggu Sandai Qin Han Sanguo Liuchao W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2]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Chen Bojun, *The Notation and Collation to the Corpus of Ruan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3] 萧统:《文选》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Xiao Tong, *Collectanea: Vol. 2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 [4] 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Yang Yong, *The Notation and Collation to the Corpus of Tao Yuanming*,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5] 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九,见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Fan Ning & Yang Shixun, "The Interpretation to Chunqiu Guliangzhu: Vol. 9", in Ruan Yuan (eds.), *The Variorum to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6]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Jingmen Museum, *Guodian Bamboo Blocks from the Tumulus in Chu Dynasty*, Beijing: Culture Relic Publishing House, 1998.]
- [7] 汪荣宝:《法言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Wang Rongbao, *The Notation to Fay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8] 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四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Xu Jingzong & Luo Guowei, *The Collation to Hongren-edited Wenguanlin in Japan: Vol. 41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9]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Lu Qinli, *The Poetry Anthology before T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10] 葛洪:《抱朴子》,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Ge Hong, "Baopuzi", in China's Traditional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 *Collectanea of Diversified Schools: Vol. 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4.]
- [11]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Zhang Pu & Yin Menglun, *The Interpretations to Collectanea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Writers from Han Dynasty to Su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 [12]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Liu Yiqing, Liu Xiaobiao & Yu Jiayi, *The Notation to Shishuo Xiny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13] 徐坚:《初学记》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Xu Jian, *Abecedarian Authority: Vol. 1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14] 韩格平:《魏晋全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Han Geping, *The Quanshu of Weijin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6.]